

离散与聚合: 社会变迁中的桃源文化

——浅析浙江省上虞市桃园村新乡村文化现象

胡重明, 马飞炜

(浙江师范大学 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 浙江 金华 321004)

[摘要] 桃园村的桃源文化是在城乡互动中聚合而成的新乡村文化, 它展现了传统乡土文化在现代多元文化冲击之下“形散而神聚”的特征, 表明了传统在文化整合过程中的延续性和适应性。而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和谐从根本上反映的正是人们内心的和谐, 因而乡风文明的构建关键在于发挥农民的主体性和自觉性。

[关键词] 离散; 聚合; 乡土社会; 乡村文化; 传统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281(2010)04-0129-05

一、“桃花源”一瞥

桃园村位于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市西部的长塘镇, 自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钱鏐移民开荒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桃园村属于低山丘陵地形, 地域面积63平方公里, 其中山地面积6403亩, 耕地面积1328亩, 水域面积400余亩, 共有9个自然村, 自然村之间的距离相对较远, 呈散落状分布。

作为浙江省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绍兴市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全国绿色小康村, 桃园村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的典型。2008年, 村民人均收入达11026元, 越来越多的村民盖起了别墅, 购置了小汽车。如今, 桃园村更以村西南的桃花源景区而闻名, 景区内风景秀丽, 建有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长廊”和“马一浮纪念馆”。2009年, 桃园村被评为“生态环保型”农村, 其生态和谐之美享誉上虞内外。

2009年, 笔者对桃园村进行了实地调研。传统文化的流失、保存和维系, 现代文明的冲击所带

来的文化变迁与重组, 以及生态文化的新发展, 在以桃园为代表的新农村同时呈现。

二、离散

桃园村既古老又年轻。古老的是, 桃园村的木杓溪、桥下、阮家埠3个自然村在唐朝就已形成, 其他6个自然村则是在民国前后由周围一带村民开荒搬迁形成的。3个古老的自然村基本保持着原来的布局, 而后来开发的6个自然村则散落在村庄的各处, 形成了今天桃园居民点散落布局的特征, 而村民迁徙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桃园村姓氏的繁多。目前, 桃园村男性姓氏有31个, 加上女性姓氏总共有40个之多。

20世纪80年代初, 乡镇企业异军突起, 桃园村也兴起了第一股打工潮, 村民在农业耕作的同时也加入到工业生产中。20世纪90年代以来, 离土村民逐渐增多。目前, 全村30%的村民常年外出务工, 分布在上海、杭州、宁波、广州、甘肃等省市地区, 从事各类工作。此外, 村民已很少专事于农业生产, 有55%的农户在本村或者在镇上工作兼务

[收稿日期] 2010-02-01

[作者简介] 胡重明, 男,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马飞炜, 女, 浙江师范大学法政与公共管理学院行政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农, 10% 的农户做竹笋生意兼务农。另外, 5% 的农户多为鳏寡或疾病缠身者, 这些人大多靠务农和政府补贴生活。在经济结构变迁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村民成为城镇居民, 桃园村的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正如梁漱溟所言: “经济作为人生基本之事, 无人能外。经济对文化的影响势力之大, 自不难想见。在生产家庭化的社会里, 人之依靠社会是间接的。其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 是其家。但在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里, 社会化的生产方法打破了家的范围。人所直接依靠以生存者, 并不是家, 而是社会。”^[1] (PP. 27~28) 20 世纪 70 年代, 市场经济在浙江等地迅速发展起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变迁, 传统文化难以固守不变。除了经济生产方式的变革, 随之而来的城市文化、消费文化等也影响着传统乡土社会。桃园村传统的公共文化生活逐渐式微, 而农民的私性文化生活则因现代通讯、传媒等技术在乡村的传播而日益丰富。农民群体间的价值观差异由于交往圈子、身份以及贫富差距的变化而不断拉大。与此同时, 桃园村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际交往变得困难。而桃园村本身的地理特点也在客观上阻碍了村民之间的直接交往和传统“熟人社会”的维系。根据笔者调查, 村民认识本村村民大半的占 20%, 认识一半的占 40%, 认识小半的占 40%。在调查中, 不少村民也感叹到, 现在认识的人越来越少了, 青年一代几乎彼此不认识。以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桃园村乡土社会正呈现出分崩离析之状, 而桃园村的乡土文化也日益显示出“离散型”的特征。

因此, 就不难理解学者们对“乡土中国”的关切。学者们的悲观情绪在“公私文化替代论”和“农村终结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公私文化替代论认为, 乡土社会原有的公共文化将被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私性文化所取代; 农村终结论则认为, 农村终将因为“城市对现代性的垄断”而必然走向没落和衰亡。这样的观点显然过于悲观, 但无论如何, 学界已经捕捉到了乡土社会的“离散”之形, 传统乡村文化确实正处于现代多元文化的冲击之中。

三、聚合

(一) 城市

20 世纪 80 年代, 年轻人开始走出宁静的村庄来到了喧闹的城市, 成为第一批外出务工的桃园

人。这些城市的外来农民工被一些人称做“城市的新市民”。学者们发现, 传统成了这些城市的“边缘民”或者说“准城市市民”融入城市生活的障碍, 于是对他们的“二重身份”投以关切而忧虑的目光。而对于那些逐渐进入到城市的桃园人来说, 又将如何处理这种矛盾呢?

一般而言, 他们一起外出务工, 比如在甘肃做建筑小工的 5 个村民是一起跟着村里的包工头出去的。在上海开鞋店的两个村民是兄弟, 一个在上海生意做得不错后, 再带着另一个出去闯荡。如果是一个人出去干的, 一般也有朋友在当地, 或者经人介绍, 鲜有单枪匹马出去闯的。

那些走出去的人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个小型的社会共同体, 这些共同体就成了他们在城市赖以生存的“避风港”。共同体的先入者会为后来者“开道”, 为他们提供宝贵的信息和经验。同时, 在这些小型的社会共同体内, 个体间通过相互帮扶的方式消除对陌生的困惑以及远离熟悉的寂寞, 共同解决适应城市生活的问题。而正是通过这种方式, 继续以传统乡土社会的血缘关系为纽带, 让他们在面对时时袭来的新文化符号时, 不再手足无措, 也不再是采取过于激烈的抵制。当然, 农民工在城市的文化适应问题依然棘手, 可能是由于政府引导的滞后, 也可能是农民工缺乏自觉意识, 但根本上是由于农民工原有的文化观念和行为习惯使得异质文化间的矛盾冲突在短期内难以消除。由此看来, 尽管农民工日益融入城市社会, 但他们依旧游离于城市, 其文化内核和价值观仍然是乡土社会的, 这在他们走出村庄之前就已定型。

出于理性, 农民工在现代化的大潮中主动或者被动地选择了放下手中的锄头, 内心却总是在城市的边缘徘徊, 期盼着乡土的回归。在城市, 农民工将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带到了建筑、装潢、纺织、修理等行业, 朴实勤恳的作风折射出传统乡土社会的内在性格特质。吃苦耐劳的精神与现代性的工具理性存在着相融的调和性, 使他们的肌肉能量没有因传统生产工具的荒废淘汰而失去用武之地, 而是“转移到城市的水泥上去了”^[2]。可以说, 农民工奔向城市的热情与过去坚守土地的忠诚, 都源于挥之不去的乡土情结。而乡土文化则让这些“流动的乡土社会”在时空变换中呈现出一股向心力。

(二) 乡村

对于在外务工的农民来说, 土地仍然是他们的根。尽管有大批的村民走出了祖祖辈辈居住生活

的村庄,但是留在桃园的仍是多数。他们不再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而是将农业作为了弃之不舍的“副业”。大部分村民在村庄附近工作,利用清晨或傍晚等空闲时间进行劳作。尽管村民的经济收入已很少来源于农业生产,但是“土地犹骨肉”,村民对土地独有的眷恋并没有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淡漠。即使是离乡的村民也难以割舍对土地的情结。桃园村有 30% 左右的家庭已经多年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桃园村几乎没有抛荒的土地。这些不从事农业生产的村民将土地委托给亲戚或者邻居经营。在这一群人中,部分已在城市拥有住房,有着丰厚的收入,完全不需要从事农业生产。

回溯农耕社会的历史可以发现,传统的生产方式天然地把人与自然联系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既是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也是依赖自然、顺应自然的过程。以土地为代表的自然成了农民生产的对象和生活的基础,因为人从根本上还无法改变自然的性质,只能通过劳动影响自然发展的范围和程度,所以人始终是自然整体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在乡土社会中,土地及自然成了农民心灵归宿的外在承载物,在一定程度上制造和维系着他们心中本体性的安全感。于是,在面对那些不得不改变的生产生活实践时,他们一方面大胆地应对着,适时地调整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体会着现代技术所带来的生活便利;另一方面,又在内心深处无法剥离过去与乡土合二为一的思维习惯和行为方式。尽管桃园村在一夜之间就有了自己的村网站,忙碌于工厂的村民再也不用亲自上街贩卖农特产了,可是这一新成立的“网上社区”,还是不如每天聚在活动室里打牌、聊天来得随心。串门、聚在一起诵经或是去田间地头劳作,遇到特别的日子集体去寺庙祭拜,依旧是桃园村老人们生活中最为平常的事情。

“个体生活历史首先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到他说话时,他就成为了自己文化的小小的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的习俗就是他的习俗,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3](P 2)}由此看来,虽然现代化给桃园村带来了太多的新鲜事物,诸如生产工具、生活条件的更新以及人口结构、交往空间的改变,但传统乡土社会人际交往的方式和思维习惯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而是凭借文化的惯性,以不同的方式一直保存和延续下来。

因而,当笔者走在桃园村时,眼前呈现的并不是分崩离析的惨淡景象,而是民风依旧淳朴的和谐图景。和谐的真正意义在于“和而不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涵:一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二是人际关系的和谐;三是不同质文化的和谐。不同质文化的和谐正是通过人与自然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来体现的,因而,和谐乡村文化的形成正是一个通过文化整合形成和合文化的过程。所谓文化整合,就是把不同的文化要素按照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需要重新建构成一个内在有机联系的文化整体。从此意义上说,“离散”的桃源文化在遭遇现代多元文化冲击的同时,也并非如农村终结论或“私性文化替代论”所讲的那样否定传统。事实恰恰相反,传统正大胆地与现代对接,呈现出自然地“适应”和“聚合”。

这种聚合表现为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各种异质文化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影响。在这一聚合过程中,传统乡土文化与现代多元文化一方面存在互相输入,不断地交织与融合;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矛盾、对立与妥协。

改革开放后,桃园村也一度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在村内开矿山、办纸厂和电镀厂等。这些企业严重破坏了桃园人所赖以生存的乡土环境。在初尝生态破坏之苦后,桃园村迅即改变了发展方向,关闭采矿、电镀厂等污染企业,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招商引资也以保护自然环境为前提,发展绿色农业,建设自然生态风景区,成为新农村建设中风景优美、生态和谐的小康村。

现在,位于桃园村口西南方向 2000 米的桃花源景区已声名远扬,吸引着来自省内外的游客前来休闲、观光。2008 年,桃花园景区共接待游客 26 万人次,门票收入达 14 万。景区依山水地理优势而建,以桃花源水库为中心,四周群山环抱。文化长廊和马一浮纪念馆为景区增添了人文气息。烧烤、垂钓、游泳、泛舟是景区内的特色趣味活动,游客们还可在“农家乐”随时品尝到富硒竹笋、笋煮干菜等地方特色美食。桃花源景区已被国家批准为 2A 级景区,并开始实行封闭式经营管理。2004 至 2008 年,桃园村共投入资金近 300 万元对景区进行开发和建设。为了进一步促进旅游发展,打造生态乡镇、旅游乡镇,争创国家 3A 级景区,经长塘镇党委、政府与桃园村协商研究,决定将桃花源景区交由长塘镇旅游开发公司开发管理。

从掠夺自然到尊重自然的转变无疑是桃园人

对传统的一次救赎。面对外来市场力量的介入,传统的桃园乡土社会作了一次更为大胆的尝试,对根植于土地的传统生态文化以一种新的方式进行整合,即通过发展生态旅游、生态农业等经济形式,将传统生态观与现代市场化的运作形式结合起来,同时将地方传统文化资源引入到生态旅游之中,实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的良性互动。这种对接一方面体现了传统对现代的包容和接纳;另一方面也是对现代性的反思,区别于工业化的现代经济发展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又带有后工业社会的影子,可谓多元文化的有机整合。这种对接带来的正是桃园乡土社会朝着“扎根土地”、“天人合一”本源价值的回归。

(三)田野省思

乡土中国以传统儒家文化与小农经济为基础,走过了数千载春秋。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国家的文化控制使乡村文化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着相当的同质性。可以说,直到改革开放之后,乡村文化的这种封闭局面才被打破,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日趋呈现出多元化和离散型的特征。学者们对现代性下的乡村文化命运的认识是矛盾的,他们一方面强调“改造”乡村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割舍不了对传统乡土中国的依恋。这种矛盾也印证了学者自身的文化身份。但是,如部分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沉淀了漫长历史的乡土中国真的将陷入无法越过左右摇摆的“拆”与“建”的矛盾循环吗?笔者看来,虽然国家控制和经济生产基础保证了乡土中国的完整性,但乡村文化自古以来并不是封闭的,尽管自上而下的渠道被国家的控制力所左右,但乡民自己走出去、自己修缮的通向外界的道路从来没有被封堵过,只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呈现着不同的状态,而现代化为乡民通往外部世界开辟了更为宽阔的道路。

异于农村终结论者对乡村文化前景的消极悲观,我们所看到的却是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仍然秉持乡土特质的社会主义新农村。2008年,桃园村村民回桃园村新建房屋或者翻修旧房的共有26户。这些村民常年外出务工且在外亦有住房,已经基本适应了城市生活,甚至大部分已经是城市市民,但是,他们还是将桃园村作为“最后的归宿”。其中的重要原因即是落叶归根的情结使然。这种心灵的归宿感源自口口相传的教化和从小生长环境的耳濡目染。那些外出务工、经商者离土离乡,可是经营的依旧是家族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

仍然是血缘关系。现代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传统桃源文化的外壳,却在离合变迁中形成了一种“形散却神聚”的新乡村文化。

露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对文化的发展指向作了如下描述:人们既然接受了赖以生活的价值体系,就不可能在其生活的另一个部分按照相反的价值体系来思考和行动,否则就势必陷于混乱和不便。他们将力求更加和谐一致。他们为自己准备了种种共同的理由和共同的动机。一定程度的和谐一致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整个体系就将瓦解^{[4](PP. 8-9)}。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传统并不仅仅是一个管家婆,只是将她接受过来的东西忠诚地保存着,然后毫不改变地保持着并传给后代”,它也“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5](P. 41)}。传统桃源文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进行文化的扬弃和整合。现代化技术运用于农村的生产生活之中,相对落后的生产手段和工具被主动或被动地抛弃了,农民的生活质量得以改善,器物和技术更新换代在某一时间内先于文化的变革,传统精神通过新的渠道与现代文化甚至是后现代文化相“嫁接”,从而在“扬弃的聚合”过程中显示出新的活力。

这种聚合同时具有肯定和否定的双重意义,既意味着保存、保持,又意味着停止、终结。而双重意义互相联结,就是“既被克服又被保存”,即新事物对旧事物的否定,但这种否定不是简单的抛弃,而是克服、抛弃旧事物中消极的东西,并促使其发展到新的阶段。这种否定的结果,既使新旧事物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又将新旧事物联系起来成为有机的整体。可见,扬弃体现在文化的传承、交流、融合和创新的全过程中,而传统正是聚合的基础和依托,而且传统本身亦为文化聚合的结果。

四、离合中的乡村文化

古代桃花源反映了魏晋时期知识分子坚守自身本体价值,欲逃离世俗纷争的隐逸文化精神,不仅展现了自然之美,更体现了人性之美。而现时代的桃源显然已不是文人笔下与世隔绝的乌托邦,而是在现代城乡互动、多元文化交织相融中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古代的桃源文化属于农耕社会的世外桃源,其高度的认同感归于远离尘世的文化独立性和价值单一性,基于乡土社会扎根土地的生产生活方式。而现时代的“新桃源文化”则是以

传统文化与乡土文化的精髓为内核、以生态文化与现代文化为导引的新型乡村和谐文化,反映了农民离土不离宗的本性特质和勤劳进取的传统品格。新桃源文化没有背离“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虞舜精神、没有放弃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而是将对传统的忠诚与对多元文化的包容结合起来,发展富有的人文关怀的和谐的现代乡村文明。

在每一个时间序列的断层上,一定地域的人们都有其当时的道德规范和心理契约,而文化正是通过与他者的妥协和人们的实践以形成其和谐的运行机制。正如汤因比对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评价一样:“如果你拿它当历史来读,你会发现其中充满了虚构;如果你拿它当虚构的故事来读,你又会发现其中充满了历史。”^{[6](P.74)}历史的逻辑甚至在前现代、现代以及后现代的时空交错中都演艺着自在的规律。以口述的方式实现从个人到集体的认同,传统文化的适应自有其独有的生存机理,因为它归根到底不是器物的传递,也不是祭祀仪式的简单复制,而是在与外界文化的不断沟通中逐渐肯定自我身份、形成角色认同。也许正是那些“陌生人”的造访强化了让心灵归于宁静的本体安全感,既维护了“熟悉”的信条,又通过发展与陌生的关系,求同存异,使传统在更广阔的领地得以扎根生长,成为时空变迁中不可轻言撼动的聚合力。这种聚合不仅是自我的维系,也是自我的超越。凭此而论,新桃源文化的形成倚赖的正是其自身的内在张力与适应性。

当然,社会共同体的和谐源于人们对它的归属和认同的情感,但更依赖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契合。个人追求幸福的过程若与他人相冲突,可能会产生零和局面。而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无疑面临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冲突,因而“乡风文明”的构筑仍需警惕吉登斯所讲的现代性的“强迫性”。以此来说,浙江省农村兴起的“种文化”便不

能只囿于过程和形式,而应防止在市场化运作中产生异化的负面影响,其关键在于通过培养农民的自觉意识、发挥其自主性。而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也正是建设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核心。和谐社会的研究未必局限于外在的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关系层面,而应深入到人的主体自身。“和谐在于心性”,社会科学的前瞻性或许正如费孝通所讲的那样,应“从共存的生态秩序研究进入共荣的心态研究”。

“传统就是自然,自然便是传统:把二者如此等同起来并不像表面听起来那样走极端。”“在现代,‘自然’变成了与城市相对照之物;它等于‘乡村’,且常带有田园意味……”^{[7](P.97)}或许正是时代的变迁使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对立起来,但同时又以新的方式使彼此重新整合起来。古桃源再无问津之人,可现时代的那些“桃花源”正以自己的方式描绘着社会主义和谐乡村的图景。

[参考文献]

- [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
- [2]孙庆忠.乡土中国与乡村文化的处境[J].江海学刊,2009,(4).
- [3]露丝·本尼迪克特.文化模式[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 [4]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 [5]周尚意,孔翔.文化与地方发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 [6]汤因比.历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 [7]安东尼·吉登斯.自反性现代化:现代社会秩序中的政治、传统和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责任编辑 李静丽)